

边界效应与省际边界区经济发展[※]

——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

曾 冰

【内容摘要】以新经济地理学为分析视角研究边界效应对省际边界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最终得出:当边界阻抗系数高于一定程度时,边界效应对经济发展呈现地是一种屏蔽效应,此时省际边界区经济容易被边缘化,处于落后水平;而当系数低于一定程度时,边界效应会表现出中介效应,此时省际边界区会得到有效发展,省际边界区发展关键在于边界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变,而不是一味地对边界区进行输血式扶持。此外,人们的本土偏好在一定范围也会影响到边界地区的发展。

【关键词】省际边界区;阻抗系数;中介效应;屏蔽效应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所谓省际边界区是以省级行政边界为参照起点,向行政区内部横向延展一定宽度,并沿边界纵向延伸所构成的窄带型区域。^[1]目前我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计有66条省级行政区陆路边界线,总长5.2万千米,在这些边界两侧共分布着849个县级行政单位,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7.9%。^[2]这些地区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等要素丰富,有着“金边银角”之誉,但大都处于各省经济体系的末梢,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边缘区,而且很难被纳入到省级政府的区域发展重点战略之中。这种经济边缘化的性质导致省际边界区与中心区尤其是省会城市经济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肖金成就曾指出,地区间最大差距不是城乡差距,也不是省际间差距,而是省会城市与处于边缘地位的边界区的经济差距。^[3]此外,省际边界区作为省际合作的前沿地区,具有开展省际合作的优越条件。但省际边界区内经济摩擦频繁,空间协调难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贫困人口研究”(项目编号:14XJK003)。

作者简介:曾冰(1986—),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81),博士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

度较大, 统筹发展难点较多, 各省边界地区同省外地区来往存在严重的地区封锁和行政壁垒, 导致基础设施、生产要素、服务体系、物流等方面都是“背靠背”地向着本省中心地带“向心”分布, 而省际边界区发挥着“隔离带”的作用, 并增加了要素流动的成本, 造成了对商品经济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的阻碍, 影响了自身内生性发展。总之, 省际边界区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滞后性, 是区域发展的最容易被边缘化和遗忘的角落, 但也是一块十分具有研究意义的问题区域。

早在1993年郭荣星在《中国省级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一书中就以省际边界地区发展作为研究对象, 并首次提出边界区域经济学的设想。^[4]此后省际边界区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起来。从当前省际边界区研究现状来看, 主要沿着理论解释和发展建设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从理论解释层面展开研究, 主要有行政区经济理论, 强调了行政区对辖区经济发展过度干预作用, 为省际边界地区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5]安树伟在对省际边界区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行政区经济理论和中心边缘理论提出了行政区边缘经济理论, 认为由于行政区经济和边缘化双重作用下使得省际边界区发展呈现一种特殊的、具有分割性和边缘性的经济现象, 从而深化了省际边界地区发展研究, 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2]此外, 由于省际边界地区涉及行政区间博弈, 周黎安、丁建军等人研究地方政府在财政激励、政治晋升体制下, 如何对省际边界地区中的市场分割和整合进行空间博弈, 形成了所谓的空间博弈理论。^{[6][7]}郭荣朝借用生态学中的“边缘效应”概念, 分析了省际边界区发展具有关联集肤作用, 但在如何解决省际边界区滞后性方面未能提出有效措施。^[8]

而关于如何发展省际边界区经济的文献则颇多, 也是目前研究的主要部分。一方面从影响因素角度来分析省际边界地区发展, 主要有制度因素、交易成本、交通因素等。如周黎安认为我国官员绩效考核制度会使得省际间竞争激烈, 经济合作激励不足, 并最终导致了省际边界区的经济落后。^[6]仇方道等人认为由于政策、边界阻隔等因素带来了交易成本过高, 从而导致省际边界区经济活动的效率低下, 难以形成有效的内生型发展机制。^[9]另一方面从发展途径和模式来分析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 如刘玉亭等人先从经济发展程度将省际边界区分为弱弱型、强弱型、强强型三类地区, 并依此提出了弱弱联合式、强弱互补式, 强强协作式开发模式。何龙斌认为省际边界区要想实现经济上跨越式发展, 最好的途径就是积极创造条件接收周边中心城市的辐射。^[10]而冷志明等人则认为省际边界区城镇规模小, 辐射力不足, 应积极培育具有省际边界区特色的中心地, 并加强中心城镇扩散效应的发挥。^[11]另外, 也有部分学者从产业角度发展省际边界区经济, 但大都是依据省际边界区的资源特色来重点发展能源产业和旅游业, 如对晋陕蒙边界区工矿产业开发, 大湘西旅游圈的联动开发, 川黔渝三角旅游区的构建等。^{[12][13]}而在制度建设上, 冷志明则从动力、组织、决策、整合等内容上设计了一套如何加强省际边界区经济

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机制。^[14]

另外,边界效应十分引人关注。我国学者在研究边界效应时大都从省际间经济发展变化来逆向分析边界效应,如行伟波和李善同(2009)通过计算我国跨省的贸易流动情况,即在控制相关变量情况下,以省际贸易和省内贸易量的差异变化来衡量边界效应变化。^[15]赵永亮和刘德学以相同要素和产品价格或边际报酬在空间上分布差异来衡量边界效应,运用各省市间的价格差异的方差作为被解释变量,验证了我国省际边界效应的存在。^[16]而李郁和徐现祥(2005)则以各省份间产业结构或经济增长的趋同性为出发点,认为趋同趋势越快意味着地区间差异小,则说明了省际间经济联系越紧密,边界效应越小,而边界效应变化也就反映了市场一体化程度。^[17]这些文献一方面很少着重探析边界效应的本质特征,以及边界效应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机制,从而将边界效应潜在地理解成屏蔽效应和负面作用;另一方面鲜有从边界效应视角分析其对省际边界区的发展情况,边界效应只是用来衡量各省总体发展情况,即将各省看成一个总体,而没有在把省域分为中心和边界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分析,因此这也导致了相关文献在分析边界效应时一般都落入到区域协调和合作、地方保护等传统理论分析框架中去,从而难以针对省际边界区特殊性而得出有效的发展机理和对策。

省际边界区的发展既有省际协调合作的共性,但又由其自身的特殊性。事实上,边界作为行政区域管辖范围的界限,一方面需通过边界来实现自身发展和主权保护的需要,另一方面该地区又要通过边界同外界地区进行物质、信息等交换来获取发展,因此行政边界既具有屏蔽性质又具有中介性质,进而边界的双重性质会使得边界效应会表现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18]当边界对地区间经济行为最终表现为阻碍效果,我们就称此时的边界效应体现为屏蔽效应。相反,如果边界对跨界经济往来最终表现为中介功能,则边界效应体现为中介效应。边界效应具有复杂性和动态变化,并进一步影响到跨界经济行为,尤其是对边界区的经济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因此,从边界效应的角度去分析省际边界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变化、发展机理和格局,能为此类地区的发展寻求一个可靠的理论支撑,从而深化理解省际边界区经济滞后性的根源,找到它的发展动力和优化路径,发挥省际边界区的整体效应,聚集优势资源,实现省际边界区经济协调开放发展、突破贫困恶性循环怪圈。本文将对此理论支撑做一个尝试性研究。

二、边界效应对省际边界区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一) 假设条件和模型设置

我国目前省际边界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最大的差距就是同自身省域内部中心城市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源于经济活动的不均匀分布,而经济活动的区域空间分布的

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又会导致区域之间发展程度的差异,而造成经济活动聚集与分散的空间布局的机制和影响因素必然也是不同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上看,采用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视角,以核心—边缘模型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引入新的变量和放松原有的假定条件进行拓展分析,有利于分析边界效应对省际边界区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影响作用,有利于理解省际边界经济滞后性发展,并对我们理解省际边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为了使模型尽可能简化,同时又能确保假设和现实结论能有一定的合理距离。在这里我们借用克鲁格曼等人的三地区模型来加以分析。我们先假设一个存在三个地区0、1和2的经济体,0表示省外地区,而地区1和地区2表示该省的内部地区,并分为两大部分:以省会为中心的中心地区1,及省际边界地区2。^[19]在该省范围内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该省的劳动力总供给量为L,并且在地区1和地区2之间流动,但不存在省际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尽管我国都存在大量农民工的流动,但是当前的户籍制度限制了省际劳动力的实质性流动,尤其是劳动力的身份上的转变。每年春节时的返乡高峰就是一种很好的例子。因此,可以将省际间劳动力流动近似为零流动。我们假设每个劳动者只提供1单位劳动。此外,我们不考虑农业部门的消费情况,或者假设不存在农业部门,这样做的好处是省去一些参数带来的计算麻烦,但又不影响模型的核心机制变化。

因此,我们假设经济体中的消费者只消费工业制造品,其效用符合不变替代弹性函数(CES),即 $U = (\sum C_k^{(\sigma-1)/\sigma})^{\sigma/(\sigma-1)}$ 。其中, C_k 为消费者对产品*i*的消费量, σ 为产品间的消费替代弹性,且大于1,关于工业部门我们引入D-S垄断竞争模型框架。^[20]并假设在地区制造业企业生产产品*k*的话,既含有固定成本(为 α),又含有可变成本(为 βx_{ki}),记为 $Z_{ki} = \alpha + \beta x_{ki}$ 。对于生产者来说,其利润最大化时的价格策略就是根据边际成本的不变加成法定价,记为 $p_i = \beta w_i \sigma / (\sigma - 1)$ 。由于产品价格与产品种类无关,因此去掉了*p*的下标*k*。同时,这些企业面对的又是垄断竞争市场,意味着其他企业可以自由进入,从而导致均衡时每个企业均衡利润只能为0。此时我们又可进一步得到每个企业均衡时的产品产出量,即: $x_i = x = \alpha (\sigma - 1) / \beta$ 。从上式可以看出,每个企业的均衡产量是固定的,且同产品种类及地区无关,故可去掉*x*的下标*i*。因此,每个企业的所需要的劳动力总量为 $\alpha\sigma$ 。如果地区*i*所拥有的劳动力禀赋为 L_i ,则均衡时地区*i*所能生产的工业产品种类数为 $n_i = L_i / \alpha\sigma$ 。该式子给出了两个重要的经济学特征:第一,一个地区的产品种类数与该地区劳动力数量呈现比例关系,劳动力的转移也就是企业的转移;第二,一个劳动力投入多的地区要比投入量较小的地区所生产出的产品种类更多,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规模效应。^[21]

为了简化讨论,我们选择合适的计量标准和单位。关于产品单位,我们可以把

它标准化, 没必要一个一个计数, 可以把它按批来计量, 如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打。因此, 我们通过标准化, 使得工业劳动力供给等于产品种类数量: $n_i = L_i$ 。

接下来, 考虑地区间的交易成本。为保持企业的需求弹性不变, 我们引入冰山成本的概念, 即假如省内地区间在运输产品时, 一单位产品最后只剩下 $1/\tau$ 个单位产品, 其余的部分则在运输过程中融化了。而对价格来说, 省内任一地区产品运输到省外地区, 其到达价是离岸价的 τ 倍。^[22] 对于省际之间的产品输出来讲, 假如从省外输入产品, 则到达省内任一地区的最终价格是其离岸价的 ρ 倍。因此, 系数 ρ 的变化其实体现了省际边界的作用程度, 而系数 ρ 变化对省际间经济行为的影响效果变化也就反映了边界效应变化, 进而这种边界效应的变化又会对省际边界区的经济活动空间带来影响。在这里, 我们将 ρ 定义为边界阻抗系数。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 ρ 又可看成省际间的交易成本。同时为了简便化, 我们假设向省外输出产品时不存在运输成本, 因为我们以某省为研究对象。对于该省出口来讲, 该省肯定会考虑产品输出能够最大化, 故对该省来说, 所发生的出口贸易的运输成本为零。不过, 该省出口这批产品对于他省来讲就是进口, 此时对于他省来说其进口产品的贸易成本则存在, 但这个贸易成本则属于其他省的研究范围。由于省际和省内背景情况会存在不同, 因此, ρ 相对于 τ 来讲, 其背后的形成机制更为复杂, 会受到自然地理条件、交通基础设施等显性因素的影响, 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来自地方保护、政府间税收竞争等隐性因素的影响。

结合效用函数和运输成本, 我们可以得到每个地区实际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首先, 我们对生产产品总数分别在三个地区加以份额定义, 每个地区的产品份额实际上也等于他们的劳动力输入份额, 即:

$$\lambda_i = \frac{n_i}{\sum_1 n_1} = \frac{L_i}{\sum_1 L_1}$$

我们以省外地区的工资率为计价单位, 则价格指数可进一步转化为:

$$P_0 = K [\lambda_0 + \lambda_1 w_1^{1-\sigma} + \lambda_2 w_2^{1-\sigma}]^{\frac{1}{1-\sigma}}$$

$$P_1 = K [(\lambda_0 \rho^{1-\sigma} + \lambda_1 w_1^{1-\sigma} + \lambda_2 \tau w_2)^{1-\sigma}]^{\frac{1}{1-\sigma}}$$

$$P_2 = K [\lambda_0 \rho^{1-\sigma} + \lambda_1 (\tau w_1)^{1-\sigma} + \lambda_2 w_2^{1-\sigma}]^{\frac{1}{1-\sigma}}$$

其中, $K = (n_0 + n_1 + n_2)^{\frac{1}{1-\sigma}}$ 。假设省外地区劳动力 L_0 是给定的, 并且省内两地区的劳动力分配如果是已知的, 分别为 L_1 、 L_2 , 且 $L_1 + L_2 = L$, 进一步我们可以得到短期均衡时工资率。但劳动者迁移的标准是按照地区间实际工资差异来决定的, 因此, 我们还需知道均衡时实际工资如何决定的。然后再来分析何种分布情况才是稳定的。最后我们再考虑这种稳定均衡是怎样被作用于阻抗系数的, 也就是 ρ 。

首先, 各地区的消费者的收入主要用来消费三地区的产品, 例如地区 0 的消费

者收入消费情况如下式:

$$Y_0 = n_0 p_{0\rho} C_{0\rho} + n_1 p_{1\rho} c_{1\rho} + n_2 p_{2\rho} c_{2\rho}$$

其中, Y_0 为地区 0 的收入, $p_{1\rho}$ 为地区 1 产品在地区 0 的销售价格, $c_{1\rho}$ 为地区 0 消费者对地区 1 产品的消费量, 以此类推。由于消费者效用函数是拟线性偏好, 求解效用最大化可得:

$$c_{0\rho} = c_{1\rho} \left(\frac{p_{0\rho}}{p_{1\rho}} \right)^{-\sigma}$$

$$c_{2\rho} = c_{1\rho} \left(\frac{p_{2\rho}}{p_{1\rho}} \right)^{-\sigma}$$

将两式同时代入到地区 0 的实际价格消费指数公式中, 则有:

$$p_{1\rho} c_{1\rho} = Y_0 \left(\frac{p_{1\rho}}{p_0} \right)^{1-\sigma}$$

上式说明了地区 0 的消费者地区 1 产品的消费收入; 同理, 我们还可得出不同地区消费者对其他地区产品的消费情况。而地区 1 的总收入来源于该经济体全部地区对地区 1 产品的支出。可得:

$$w_1 L_1 = n_1 \left[Y_0 \left(\frac{w_1}{p_0} \right)^{1-\sigma} + Y_1 \left(\frac{w_1}{p_1} \right)^{1-\sigma} + Y_2 \left(\frac{w_1}{p_2} \right)^{1-\sigma} \right]$$

$$\text{进一步简化为: } w_1 = [Y_0 p_0^{\sigma-1} + Y_1 p_1^{\sigma-1} + Y_2 (p_1/\tau)^{\sigma-1}]^{1/\sigma}$$

$$\text{同理得: } w_2 = [Y_0 p_0^{\sigma-1} + Y_1 p_1^{\sigma-1} + Y_2 (p_2)^{\sigma-1}]^{1/\sigma}$$

这样, 我们就得到了省内地区的实际工资: $\omega_i = w_i/p_i$ 。由于省内劳动力是按照实际工资高低来考虑迁移的, 因此, 当省内两地区的实际工资相等时才能实现均衡。不过, 这样的均衡并不一定是稳定的, 因为我们还需要从区域经济活动均匀分布状态和区域分异的极端状态来衡量这种均衡的稳定性是否可以持续。为了进行基本的动态分析, 我们施以一个简单的劳动力供给动态调整机制, 即: $dL_1/dt = -dL_2/dt - \delta(\omega_1 - \omega_2)$, 或 $\dot{S}_1 = s_1(1 - s_1)(\omega_1 - \omega_2)$, 其中 s_1 为地区 1 劳动力份额。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机制下有两种类型的长期均衡解。一个是内点解, 即两地实际工资相同所得到的均衡结果; 另一个是角点解, 即工业劳动力全部集中于某一地区,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核心边缘解, 如 $\omega_1 > \omega_2$ 时, 则人口完全集中于区域 1 的情况就是一种均衡, 反之则集中于边界地区 2。至此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正式的分析模型, 通过考虑 ρ 变化, 就可以分析边界效应的变化如何对省际边界区的经济活动空间产生影响。

(二) 机理分析

尽管我们模型的逻辑简单易懂, 但是实际工资我们很难用显函数表示出来, 很难取得解析解, 因此只好借助于数据模拟来分析。通过数据模拟得出实际工资差异和地区 1 的工业劳动力份额, 然后将两者建立坐标可得相应滚摆线图。根据 dL_1/dt

$= -dL_2/dt - \delta(\omega_1 - \omega_2)$ ，考虑实际工资相等时的对称均衡点。如果滚摆线斜率是向下倾斜的，此时均衡是稳定的；如果它是向上倾斜的，这种均衡就是不稳定的。对于角点解来说，假如人口全部集中于地区1，且地区1的实际工资大于地区2，那么角点解均衡就会维持下去。^[22]

在上述模型框架中， L, σ, L_0 等外生给定，我们令地区1和地区2所在的省份的总劳动力标准化为1， $\sigma = 4, \tau = 1.4, L_0 = 10$ 。接下来运用上述动态分析机制来分析三种不同类型的阻抗系数下的实际工资变化与地区1劳动力空间分布变化。我们首先假设该省经济是完全封闭时的情况，此时的问题焦点就变成了在什么情况下，人口完全集中于地区1或地区2才是一种均衡。在清楚了这类封闭情况下的均衡，我们就不难理解该省经济在开放时的演变机制。

图1为阻抗系数足够高的情况下的空间结构。我们发现地区间均衡分布的结构是不稳定，只有核心边缘的情形才是稳定的。因此，对于省内地区而言，经济活动将会集聚于那些条件优越的地方。边界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获得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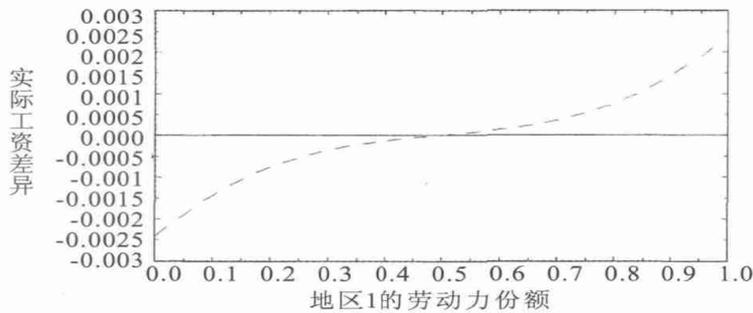


图1 $\rho = 1.85$ 时，实际工资差异与地区1的劳动力份额关系

图2演示的是经济阻抗系数处于中间状态的情形，省际间开放度有所提高。此时会有两种均衡状态。一个是对称结构，此时省际边界地区也能得到有效发展；另一个就是核心边缘结构，也具有稳定性。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预期会起到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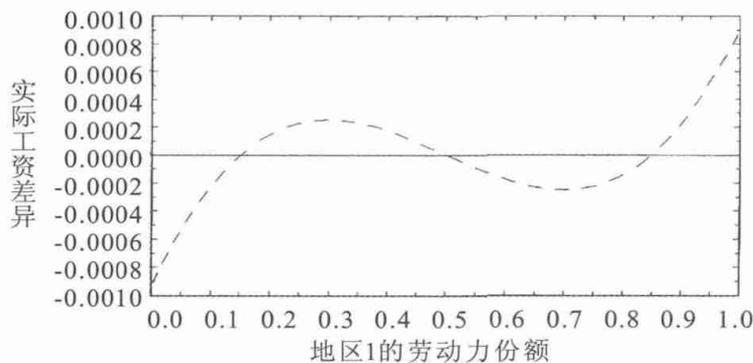


图2 $\rho = 1.81$ 时，实际工资差异与地区1的劳动力份额关系

图3演示的是经济阻抗系数足够低的时候,这意味着省际间经济开放度很高,此时只有对称结构才是稳定的,说明一方面中心区的分散力大于集聚力;另一方面省际边界地区作为省外地区经济交流的前沿,开始呈现出发展潜力,并且该地区的集聚力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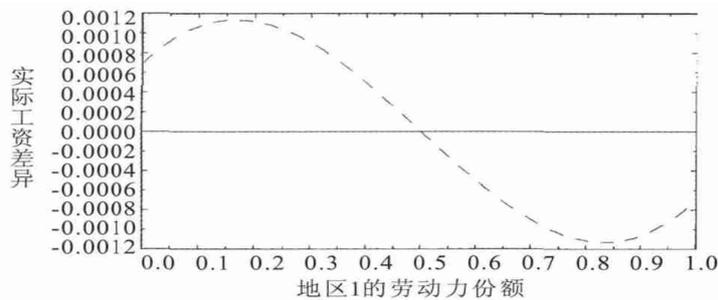


图3 $\rho = 1.77$ 时, 实际工资差异与地区1的劳动力份额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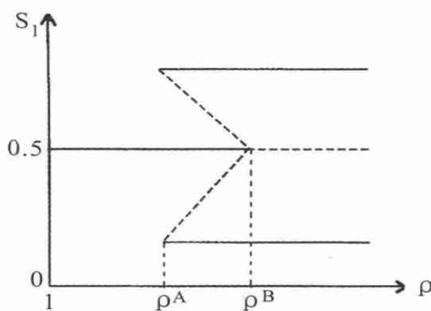


图4 关于省际阻抗系数 ρ 的战斧图解

我们再通过图4所演示的战斧图来重点分析省际间阻抗系数变化是如何影响省域内部人口集中变化尤其是省际边界区的空间结构变化。首先,我们考虑一个极端情况,即假设 ρ 无限大的情况下,这样我们就可以无视省外经济情况,这种情况也就演化为典型的两地区核心边缘模型。由于省内地区间贸易成本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更容易集中于省会为中心的中心地区,因为省会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政策区位优势。而广大的省际边界区相对于省会等中心城市在区位、政策等条件上都处于劣势,这也就决定了省际边界区大都沦为各省的边缘地区,且省内经济空间结构呈现稳定的核心边缘结构。^[16]而我们一旦降低省际间经济阻抗系数,提升开放度,尽管这种核心边缘结构起初并不容易打破。但是到了一定程度 ρ^A 后,之前的核心边缘结构会被打破,一种具有循环性的解体过程开始发生。因为省内外市场足够开放,导致原有的中心地区因市场规模效应和价格指数而形成的集聚力大为下降,省际间的经济活动频繁也带来了中心地区的分散力大大增加。此时作为边缘地区的省际边界区尽管离中心地区相对较远,但容易接触到省外市场的影响,市场潜能得到

提升,吸引更多的经济要素流向省际边界区,不断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从而打破原来的边缘结构。

如果反过来看,我们首先假设省际间具有很低的阻抗系数,即省际间市场开放度足够大。这时劳动力在区域间均匀分布。但随着阻抗系数达到 ρ^B 后,最终有关集聚的循环因果链产生,无论任何一个地区只有具有有一点小的优势,就会形成滚雪球效应,最终导致经济资源集中于该地区。无疑省会城市为主的相应中心地区要比省际边界区具有绝对优势,也就注定了前者会集中该省的绝大部分经济资源,并加剧了边界地区经济形势恶化。

由上述内容可知,系数 ρ 的变化来自于省际边界的作用程度,而系数 ρ 变化而导致省际边界地区的经济活动空间变化也就反映了边界效应的作用。当边界阻抗系数越高,区域内企业难以借助区域外部的生产条件,导致中介效应被大力抑制。此时边界效应以屏蔽效应为主导,并导致省内经济分布会表现为稳定的核心边缘结构,省际边界区经济发展被边缘化。而如果省际间开放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则该省内的资源容易分散化,同省外地区的协同作用加强。因此,此时边界效应以中介效应为主导地位时,空间结构易表现为稳定的对称结构,此时省际边界区能够得到有效发展。

这些结果能很好地解释当前我国省际边界发展情况。在省域经济发展封闭情况下,或者省际间竞争激烈,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时候,边界效应表现为屏蔽效应,省际边界区发展第一性发展条件如地理条件大都较差,且第二性条件如政策倾斜,交通设施等都远落后于省会、地级市等中心地区,导致了省际边界地区发展的边缘化。而一旦省际间开放度提高,边界效应表现为中介效应,省际边界地区将会提升到重要的发展地位,中心地区由于分散力大于集聚力,而边界地区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并不断显现出中介优势,成为省际间合作的前沿,为边界地区市场潜能加大,不断凸显出其重要的经济潜力。

我们也注意到,当处于叠加区 $\rho^A < \rho < \rho^B$ 时,对称结构和核心边缘结构都是局部的长期稳定均衡,也就是说此时省际边界地区即有可能实现高效发展,也有可能成为经济洼地。但由于文化、语言等差异导致劳动者存在本土偏好,会预期边界地区的经济环境劣于中心地区,因此大多数人不会选择边界地区。故人们的这种本土偏好会使得边界效应呈现出屏蔽效应,从而使经济结构走向核心边缘结构。换言之,此时边界效应导致的核心边缘结构更多地是由于人们的本土偏好造成的。

另外,从图4我们可以看出,当阻抗系数降到一定程度 ρ^A 后,对于该省来说,对称结构具有稳定性。因此,我们在没有找到边界地区相应的发展突破点 ρ^A 的情况下,对边界区加强政策扶持等措施,很难改变这种核心边缘结构。这也是为什么边界地区一直很难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本文的角度看,要实现省际边界区的发展,不能一味地对边界区进行输血式扶持,关键在于强调省际间的经济自由度和外向

型发展。

三、结论与对策

在上述分析中,边界阻抗系数的变化其实反映着省际边界的作用,而系数变化而导致省际边界地区的经济活动空间变化也就反映了边界效应的作用。当阻抗系数较小时,边界表现出中介性质,省际间经济要素流动性好,地区间也能实现较好的分工协作。因此,边界对跨边界经济行为的作用效果即边界效应体现为中介效应,此时边界效应能够推动省际边界地区有效发展。而当阻抗系数高到一定程度后,边界显现出屏蔽性质,导致省际间生产要素流动少,经济往来少,边界效应体现为屏蔽效应,此时边界效应不利于省际边界地区发展。因此,要推动省际边界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提高省际间经济和市场开放度,弱化边界的阻碍性质,推动边界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变。

首先,省际间经济阻抗系数过高的根源在于相应的制度环境。应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来降低省际间的交易成本也就是阻抗系数,具体考虑完善财政体制,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改革和完善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重点应引导地方领导从专注短期利益、地方利益向谋划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转变。可考虑把能反映对外开放度、省际产业关联度等内容的量化指标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建立健全区域合作制度,把区域合作机制制度化,加强对区域合作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设计。

其次,加强区域间合作意识和措施,促进边界效应转化为中介效应。省际边界区发展要具有一种超行政区的合作大视野,尤其注重总体发展战略、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等各个环节合作。省际边界区之间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生产要素互补为前提,互惠互利,建立多层次区域经济联合,以获得整体区域的最佳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同时考虑建立跨行政区的区域管理机构,并赋予相应的决策权和调控权。

最后,从省际边界区自身角度来讲,应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创新,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作用,破除行政壁垒,弱化地方保护主义,有效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构建科技、信息、人力资源等要素共享及合理流动机制,发挥市场对经济要素跨区流动的高效配置功能,为省际边界区的经济活动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应针对自身地区情况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加强省际边界区产业分工协作,加快省际边界区城镇化进程,促进省际边界区内生性集聚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 [1] 陈 钊. 行政边界区域刍论 [J]. 人文地理, 1996 (4): 41-44.
- [2] 安树伟. 行政边缘经济论——中国省级交界地带经济活动分析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 2004: 15 - 35.
- [3] 肖金成. 省域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2004 (3): 15 - 18.
- [4] 郭荣星. 中国省级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3: 10 - 34.
- [5] 刘君德. 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59 - 60.
- [6] 周黎安, 陶婧. 官员晋升竞争与边界效应: 以省区交界地带的经济发展为例 [J]. 金融研究, 2011 (3): 15 - 18.
- [7] 丁建军, 冷志明, 等. 政绩考核方式与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J].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09 (2): 100 - 111.
- [8] 郭荣朝. 省际边缘区城镇化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30 - 33.
- [9] 仇方道, 佟连军, 等. 省际边缘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格局与驱动机制 [J]. 地理研究, 2009 (2): 451 - 463.
- [10] 刘玉亭, 张结魁. 省际毗邻地区开发模式探讨 [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1999 (5): 45 - 49.
- [11] 冷志明, 易夫. 省际边界区域中心城市的构建 [J]. 人文地理, 2008 (3): 73 - 79.
- [12] 张河清. 对构建大湘西旅游圈的初步设想 [J]. 经济地理, 2004 (4): 22 - 26.
- [13] 邱继勤. 川黔渝三角旅游区联动开发研究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4 (2): 78 - 82.
- [14] 冷志明. 中国省际毗邻地区经济合作和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研究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5 (7): 63 - 64.
- [15] 行伟波, 李善同. 引力模型、边界效应与中国区域间贸易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0 (10): 32 - 41.
- [16] 赵永亮, 刘德学. 市场歧视、区际边界效应与经济增长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 (12): 27 - 36.
- [17] 李郁, 徐现祥. 边界效应的测定方法及其在长江三角洲的应用 [J]. 地理研究, 2006 (5): 792 - 802.
- [18] 李铁立. 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15 - 57.
- [19] Krugman, P. and Livas, R. Trade Policy and the Third World Metropol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1996, 49 (4): 137 - 150.
- [20]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b, 99 (3): 483 - 499.
- [21] 安虎森, 等. 新经济地理学原理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25 - 66.
- [22] Fujita, M.; Krugman, P. and Venables, A.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Border Effe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ial Border Region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Zeng Bing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vincial border region is not separated from the border, and the border effec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where we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the provincial border region economy development, we found when the border impedance coefficient is higher than a certain degree, the border effect turn to be the shielding effect, then the provincial border regions economy is easily marginalized in a backward level. While the coefficients below a certain level, the border effect will exhibit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then the provincial border regions will obtain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ial border regions is that the boundary effect shift to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not the transfusion supporting blindly on the border region. In addition, the home bias in a certain range will also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region.

Key words: Provincial Border; Impedance Coefficient; Intermediary Effect; Shielding Effect

[收稿日期: 2015.6.25 责任编辑: 陈健生]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306 (2015) 09 - 0087 - 11